

CHONGQING FANGYAN

重庆方言

城市
与
文化

语言对于文化感情的维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持久。重庆话是巴渝文化、重庆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重庆方言的历史根源、特点与规律，探讨与其他方言的亲疏关系，首次尝试把重庆方言与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从语言学角度切入，揭示城市之间的异同。

沈 荭 ◆ 著

YU CHENGSHI WENHUA

尤其是，从为数不多的文化词语中找到了重庆与成都的不同；从一个个有趣的言子儿中发掘巴渝民众幽默豪爽的个性。透过方言词语，考察许多与地方文化相关的内容及时代变迁和社会变化。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方言与城市文化/沈荃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624-5326-0

I. ①重… II. ①沈… III. ①西南官话—研究—重庆市 IV. ①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449号

重庆方言与城市文化

沈 荃 著

策划编辑:雷少波 唐启秀

责任编辑:邬小梅 版式设计:李 懋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9.875 字数:230千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326-0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重庆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的资助,谨表谢意。



中国对韩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领土面积很大的国家,所以中国语言文化的地区差异超乎韩国人的想象。因此,不了解各地区的特点是无法深入研究中国的。过去韩国的汉语学界一直重视中央地区和以文献为主的研究,不过我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领域应该扩大到中国各地和非文献资料的范围。因此汉阳大学中文系在大韩民国教育部 BK21 研究项目之下正在组织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进行中国各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学里的文化和地域因素的研究。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学里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研究,汉阳大学 2007 年开始和国外有关单位合办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 and Language)。在首尔汉阳大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地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会议。今后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国内大学进行合作。

韩国汉学家研究汉语方言的少而又少,我本人主要从事音韵学和韩汉对比研究,也关注过中国方言,撰写过《首尔日照华侨方言调查报告》《仁川荣成、日照方言音系试探》《仁川荣成华侨汉语音系分析》《韩国华侨方言调查和研究方法》《中国方言的传统分类和计量分析》《从计量研究看中国方言的分类问题》《韩国汉字音和中国方言的语音类似度》《韩国汉字词和中国方言词类似度》等文章。我通过这些文章鼓励韩国的汉语语言学家脱离以文献为主的语言研究而多关注活泼泼的生活语言的研究,而且脱离研究中国方言的传统方

法而多关注计量研究等新的方法。

沈荭博士 2001 年初来到韩国,在韩国 5 年多的时间里,她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曾多次参加韩国各种有影响的语言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宣读并发表论文多篇,除了研究韩国学生如何学习汉语方面的论文外,还有很多文章是关于重庆方言的,比如:《重庆言子儿中的重叠现象》(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2004 年秋季学术发表大会宣读)、《小议重庆方言中的儿化词》(韩国《国际言语文学》,2005 年 6 月)、《重庆言子与巴渝文化》(第十三届“台湾之旅”论文集,2005 年 8 月;韩国《中语中文学》第 37 集,2006 年 6 月)、《重庆方言的语气助词》(韩国《中国学》,2005 年 8 月)、《重庆话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词汇的比较》(大韩中国语学会 2006 年春季学术发表大会宣读;韩国《中国言语研究》第 22 集,2006 年 6 月)、《四川话入声的演变与四川移民》(第四十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2007 年 9 月)等。

2006 年 2 月沈荭博士在韩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到美国做高访,9 月出席了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办的“第 39 届国际汉藏语学术交流会”(The 3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她用英语发表的《重庆言子儿》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大家把目光转向中国大西部。2007 年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她回到了曾经给予她创作灵感和写作土壤的重庆——一个崛起中具有新鲜活力的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经过一两年的积淀和修改,她的博士论文得以充实和提炼,“重庆言子儿和城市文化”和“外来人学习重庆话”两大部分的补充为本书增色不少,尤其对想了解重庆、想跟重庆人打交道的外地人、外国人来说十分有用。

沈荭博士曾经提交了“第四届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重庆话与成都话之比较》的文章非常符合我们研究组的研究方向。她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对重庆方言和文化的不断挖掘,这在

序

年轻一代学者当中也是不多见的,她的这种研究眼光和研究态度值得欣赏。当她 2008 年再一次到韩国参加韩中教育学会举办的国际会议跟我谈及这方面的兴趣,我毫不犹豫地请她做我 BK21 项目的子项目负责人,我很高兴我的研究队伍又增添了一位合作者、一名生力军。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我的课题组祝贺沈荭博士,同时也希望她再接再厉做好中韩两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为增进两国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和认识而努力。

请允许我借助沈荭博士曾对我说过的一句网络语言来结束这篇序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爱,只有最地道的本土语言才能传达。而沉淀下来的,是一股让这个城市所有人产生共鸣的精神之力!”

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

BK21 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组长

严翼相

2009 年 10 月 22 日



前言

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重庆、工作在重庆的语言工作者，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她的美丽，爱她的大气，爱她的幽默。重庆山水如画，长江、嘉陵江在城市的中央交汇，立体夜景绚丽多彩；重庆人豪爽直率，热情奔放，勇于开拓，勤于进取；重庆话诙谐幽默，生动而风趣。有人说，北京人有特殊的语言陶醉感，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一口甜亮脆生的京片子，让北京人钟情于“说”——海聊、神聊、神吹海哨、侃大山等。这一点，唯有以其方言而自得的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可与之相颉颃。吹牛、冲壳子、涮坛子、拌灯儿，等等。更是体现了重庆话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无穷韵味。

方言，一方之言。它是通行于一定地域的话，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中国地域辽阔，俗话说“十里不同天”，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里不通言”。“五方之民，言语异声”，自古已然。现代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每个大方言区下分为若干方言区，方言区下又分若干“片”，片下还可以分为“小片”，直至最小的方言点。重庆方言（重庆话）隶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虽与北方方言区的其他分支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自成一体，尤其是词汇更具特色。词语和语音比较起来要稳定得多，一个词的读音变了，但这个词常常历经各地而仍然顽强地保留在某些方言中。因而，活生生、形形色色的方言词汇可以引领我们探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庆言子儿”最早是由磁带讲出来的，现在，人们

认为凡是用地道的重庆方言讲的流行语、口头禅,甚至笑话,统统可以称做言子儿。书中所论及的重庆言子儿还包括重庆的俚俗语。一个个有趣的言子儿,表达了巴渝民众幽默豪爽的个性,形成了带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

语言是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着一定范围内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对于文化感情的维系,或许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持久、强韧。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积淀、造就了厚重鲜明的巴渝文化。重庆话则是巴渝文化、重庆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既传达、呈现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重庆人的生活与性格。只要用心去看,用心去读,重庆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串串幽默风趣的重庆言子儿。由此,你可以领略到巴渝文化的神韵。

本书讨论的重庆方言是指重庆主城区使用的重庆话,不包括新并入的万县市(今万州区)、涪陵、黔江等地区的重庆话。

本书使用的语料有两大来源:其一,以曾晓渝主编的《重庆方言词解》、杨月蓉主编的《重庆方言俚俗语集释》为基础,参考了《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1987)、《成都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李荣主编,梁德曼,黄尚军编纂,1998)、《重庆言子》(张老侃,2001)、《四川方言词语考释》(蒋宗福,2002)等几部有影响的词典和专著;其二,有现场谈话录音记录、相声录音、前人著作及论文里的例句,还有作者自己和朋友们帮忙造的句子。

本书在必要的地方均采用了国际音标符号,并在每个音节右上角用1、2、3、4标注声调,其代表调类与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一致,只是调值不太一样,分别是44、21、42、213;有音无字的用“□”标注,再用国际音标注其音。

本书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

CONTENTS

目录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3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5	第三节 以往的研究
9	第四节 研究的意义
10	第二章 重庆方言概貌
10	第一节 重庆概况
19	第二节 重庆方言的形成
23	第三节 重庆方言的地位
26	第三章 重庆方言音系与语法特征
26	第一节 重庆方言音系特征
33	第二节 重庆方言语法特征
97	第四章 重庆方言词汇特征
97	第一节 词语源流差异
106	第二节 造词理据差异
109	第三节 构词方式差异
116	第四节 词语意义差异
122	第五章 重庆方言词汇比较
122	第一节 方言词汇比较的意义
125	第二节 重庆话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词汇的比较

132	第三节 重庆方言特征词
147	第六章 语言与城市文化
147	第一节 重庆言子儿与重庆城市文化
186	第二节 重庆话与成都话之比较
198	第三节 外来人学重庆话
209	第七章 结 语
212	余 论
214	参考文献
225	附录 重庆方言分类词表
298	后 记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汉语历史悠久,方言复杂,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探索研究,人们对中国的方言已经有了不少认识,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关于方言的分区,有《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最新成果;在编修地方志的热潮中,已经出版的县市方言志不下千种;对单点方言作深入研究的专著和词典不下百种;单点语法描写或比较研究的专著也有数十种。而就发表过的音系来看,应在数千种之上。自20世纪50年代方言普查以来,人们就十分注重对方言的应用,让方言研究为语言教学、推广普通话、语文现代化服务。近二十多年来人们又把视野扩大到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等领域,对方言进行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

方言词汇的研究,对于划分方言,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化,都能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还能说明并解决汉语词汇学中有许多问题。特别是方言词汇的差别在人们互相交际时可能造成严重的隔阂和误会,在各方言区推广普通话时需给予极大的注意。

重庆方言存在于四川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的整体当中,研究重庆方言词汇可以继续推动四川方言研究、丰富汉语方言词汇研究成果。

方言词汇研究是整个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词汇数量庞

大,又不如语音、语法的系统性、规律性强,因此词汇研究的难度相对更大。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一)共时描写的方法

在文献调查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了传统的共时描写方法,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全面考察、重点挖掘,对重庆方言的特点进行了详尽地描述。除了整理出重庆方言词汇分类表(见本书附录)之外,还对语气助词、重叠词、儿化词、词缀等进行了有详有略地描写和讨论。

(二)比较的方法

比较研究是一种基本方法。汉语方言学自20世纪上半叶建立始,走的就是描写与比较的路子。描写的是实际调查得来的口语,比较的是纵横两面的汉语、共同语和古汉语。重庆方言是汉语方言的组成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有些现象必须通过关照其他方言才能显出其特点来。行文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了它与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差异和远近关系,并且还从文化词语的角度来对比成渝两地的差异。此外,依据李如龙先生提出的汉语方言特征词理论,对重庆的特征词进行尝试性考察和分析,期待日后作出更加深入的对比研究。

(三)历史学的方法

这主要是指基于历史文献和史料进行研究的一些方法,包括社会生活史、地方志资料、口述史的方法等。从史料范围考虑,本书主要关注重庆这座城市以及重庆方言形成的相关史料。

(四)统计学的方法

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重庆方言词汇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专门用不小的篇幅对重庆方言与普通话及各大方言的基本常用词(以北京

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的《汉语方言词汇》为蓝本)进行了亲疏程度的量化分析。统计学的方法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得出更科学、更可靠的结论。

(五)多视角解释的方法

对于丰富多彩的重庆方言词汇,笔者还从多角度来进行研究,如最后部分的重庆言子儿(狭义的重庆言子儿),笔者结合地域文化、移民因素、民俗知识等来探究这些有生命力的新词语,充分展现了重庆方言的魅力。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赣方言区(按照使用人口的多寡为序)。每个大方言下面可分为若干方言区,方言区下又再分为若干“片”,片下还可以分为“小片”,直至最小的方言点。本书所要研究的重庆方言(即重庆话),属于北方方言区下面的西南官话成渝片中的一个点。详见表 1-1。

需要说明的是,重庆长期以来是原四川省除省会城市成都之外的一个重要城市,原来的四川方言内部是比较统一的,是原四川省(包括重庆直辖市范围)的方言。就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地位而言,一般人都认为成都话代表川西方言(甚至是四川官话的代表),重庆话代表川东方言。当然,如果从新的行政区划来看,旧有的“川东”这一概念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庆和四川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统地缘、人文关系,是不可能截然按照新的行政区划把重庆方言从四川方言中完全剥离出来的。

毫无疑问,重庆话是重庆直辖市的代表方言。重庆直辖市包括

原四川省的“三市一地”(即计划单列市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占地约8万平方千米,一共有40多个区市县,人口3000多万。所以,重庆方言内部肯定有一定的差异,不过,重庆市主城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都是重庆直辖市的中心,重庆主城区话理所当然应该是重庆方言的代表方言。因而,本书将以重庆主城区话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重庆话的词汇。

表 1-1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

大区	区	片	小片	点
北方方言区	北方官话			
	西北官话			
	西南官话	四川方言 (成渝片)	川西官话 (土著区)	成都话
			川东官话 (移民区)	重庆话
		云南方言 贵州方言		
下江官话(又叫江淮方言)				
吴方言区				
湘方言区				
粤方言区				
闽方言区				
客家方言区				
赣方言区				

重庆方言词汇非常的形象生动,例如:“丁丁猫儿”,形容蜻蜓的翅膀与身子成丁字形,眼睛特别大,像猫的眼睛。“吃昂子”取其蝉鸣

的声音“呷呷昂昂”。词的结构基本上符合汉语造词法规律。最近几年来,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重庆言子儿,一个接一个地“生产”出来,表达和传递出了巴渝民众幽默豪爽的个性。例如:“霸道”形容特别好,相当于普通话的“厉害”;发源于重庆的“宝器”(形容像活宝,爱出洋相又带傻气的人)成为四川人民的口头禅;“雄起”一词更是响彻各大体育馆,替代了中国球迷长期以来没有力度的“加油”。这些新鲜的事物是值得好好发掘和研究的。

重庆方言研究不足的现状,尤其是重庆方言词汇的丰富多彩、别具一格,引起了作者的关注,本书对此将作全方位的考察和综合比较研究。

第三节 以往的研究

我们知道,重庆位于四川东部,笼统地说,重庆人说的都是四川话。研究方言的人们,常常立足于四川方言,做过不少调查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也以四川方言为题。相对来说,研究四川方言的队伍集中在四川省省会成都,这种状况自古已然。

上古和中古时期,四川境内的语言和方言状况前人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论著。今天所能见到的仅是一些零星记载,而且多半是一些蜀语词汇。例如:西汉时成都人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撰写的《猷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关于汉语方言研究最早的方言学著作)中记述有“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的方言词汇,此外,郭璞的《尔雅》、许慎的《说文》、陈彭年的《广韵》、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保留了一部分宝贵的四川方言资料,宋代诗人范成大、黄鉴和陆游在他们的诗文中也有几处提到蜀方言材料。

明清至民国初期,出现了基本系统的四川方言专著。明代四川

遂宁人李实的《蜀语》、清代四川成都人张慎仪的《蜀方言》和现代的四川遂宁人唐枢的《蜀籟》，就四川方言词汇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诠释工作。其中，李实（1596—1636年）的《蜀语》成为中国现存第一部断域方言词典。清代四川武威人张澍的《蜀典》，四川简阳人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以及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也都记录和保存了一大批蜀方言词语。1900年，中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钟秀之（Adam Grainger）编著的《西蜀方言》对研究19世纪后期成都语音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所记录的词语不仅丰富而且几乎全部与今日成都话相同。此外，明朝人张位的《问奇集》，杨慎的《丹铅总录》《俗言》《古今谚》《古今风谣》以及清朝人李调元的《方言藻》也都零星地记载了一些蜀方言材料。

20世纪40和50年代，学者们对四川方言开展了两次比较全面的规模空前的普查。第一次是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抗战迁移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丁声树、董同禾、周法高、杨时逢和刘念和五位先生于1941年秋天和1946年春夏，就四川方言进行全面调查，共查182处。之后，杨时逢先生历时七八年之久于1984年完成了240万字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第二次是1956—1958年，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现改为西南大学，下同）、四川师范学院（即为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下同）部分语言学者组成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在四川省教育厅及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组织指导下，对四川省150个汉族聚集县市的方言进行了调查，编汇出了《四川方言音系》（载1960年《四川大学学报》，这个材料系统地记载了四川各地的方音）。《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和《四川方言音系》为四川方言研究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方言史料，其历史价值在于：对四川官话的语音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科学的记录；对四川方言官话的语音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四川官话的分区提出了相同的标准，并取得了基本

一致的结论。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致使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一度停滞不前。20世纪60年代前后,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章屈指可数。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方言》的创刊,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才又开始迈开了新的步子。到20世纪80年代,四川方言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发表的文章一方面是对四川官话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四川方言源流的探讨,对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与此同时,还有好几本专著陆续出来,如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两本方言词典相继出版: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的《四川方言词典》,罗韵希的《成都话方言词典》。这一批论文的刊行和专著、词典的出版,标志着四川官话的研究已经由语音普查研究进入到词汇、语法全面调查和分析的新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化语言学逐步兴起,开启了语言研究的新视野,又有一批方言与文化及与其相关领域的论著相继面世。比如崔荣昌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民俗》等。

四川方言的研究可以说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硕果累累。然而,在传统范畴中,重庆长期被置于“蜀文化光芒”之下,因而关于重庆方言的研究就显得单薄、乏力。以下是重庆方言的研究成绩和研究队伍。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推广普通话,出版了《重庆人怎样学标准音》(李运益);20世纪60年代前后,范继淹的论文《重庆方言名词的重叠和儿化》(1962.12)、《重庆方言表动量的“下儿”和表时量的“下儿”》(1962.12/1965.6)先后发表在《中国语文》上。1979年以后,范继淹的又一篇论文《重庆方言“下”字的分化》(1979.2)在《方言》上发表。接着,又有余纪的《重庆方言中的“嘿”“惨”“只有恁个了”》(1984.2),巴言的《重庆方言既说“啥人”又说“哪个”》(1984.